



张学良将军

著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KS27.6
13-14

张学良将军

常 城 著

B27.6/13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88年·哈尔滨

B

540595

135

张学良将军

常域 著

责任编辑：遇秀伟

封面设计：黄耀城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哈尔滨道里森林街42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 × 1062 毫米 1/32 · 印张 5.875 · 字数 138 千

1988 年 9 月第 1 版 · 198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18

ISBN 7-5316-0391 8/K·5 定价：1.70 元

目 录

略论张学良将军(代前言).....	(1)
第一章 从“贵公子”到“张少帅”.....	(16)
一、童年时代的生涯.....	(16)
二、“老帅”时期的“少帅”.....	(22)
第二章 从主政东北到拥蒋入关.....	(32)
一、东北易帜.....	(32)
二、枪毙杨常.....	(42)
三、推行反日方针.....	(50)
四、倡导东北建设.....	(54)
五、中东路事件.....	(56)
六、东北军入关.....	(60)
第三章 在“九一八”国难的岁月里.....	(68)
一、奉命的“不抵抗将军”.....	(68)
二、不抵抗中的抵抗.....	(79)
第四章 下野出洋与随蒋“剿共”.....	(85)
一、下野、出洋，学法西斯.....	(85)
二、随蒋“剿共”，苦闷、徬徨.....	(93)
第五章 联共抗日，“周张会谈”，思想行动大转变.....	(103)
一、联共活动与“周张会谈”.....	(103)
二、党的真诚联合，思想行动巨变.....	(113)

三、“三位一体”的形成,西北形势改观·····	(124)
第六章 临潼“兵谏”——“西安事变”,“千古功臣”天下传	(127)
一、“艳晚事件”,“逼上梁山”·····	(127)
二、临潼“兵谏”,西安谈判·····	(135)
三、放蒋、送蒋,大义凛然·····	(159)
第七章 漫长痛苦的幽禁生涯·····	(166)
一、背信弃义的“历史剧”·····	(166)
二、幽禁溪口雪窦山·····	(170)
三、辗转幽囚流离苦·····	(173)
四、孤独岁月在台湾·····	(180)
编后记·····	(185)

略论张学良将军（代前言）

张学良将军是举世闻名的人物，向为世人所瞩目。当年，英俊的“少帅”，现已八十六岁了。他所走过的道路，是一条曲折、复杂、伟大而又坎坷的路。从旧军阀的将领到救国“功臣”，是他一生的核心时期；联合共产党，发动“西安事变”，是他一生的精华和高峰，使他成了历史上“不朽的人物”。

当“西安事变”五十周年到来之际，为纪念这位“特别使人怀念”^①的人物，对他所走过的道路，特别是他的历史功绩，做一概略的评论，对推动祖国的统一，是很有意义的。

（一）

张学良将军的一生，以他被“软禁”为界，可划分为前半生与后半生。他的后半生是漫长而痛苦的。时至今日，他已度过了五十年的“幽禁”生涯。在前半生中，他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活动，还不到二十年的时间！

这二十年，是中国历史大变动的年代：一方面是旧军阀的统治、混战与垮台；国民党的统治与混战，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另方面是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人民大革命的兴起，和汹涌澎湃的抗日救亡斗争。是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尖锐复杂的年代。

^① 《周恩来同志在纪念西安事变二十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在这些年代里，张学良的政治活动，随着历史的巨变，可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也是他“随父从政”的时期。当时，他还是军阀的“贵公子”，是国内闻名的“四大公子”之一，生于权门，养尊处优。他父亲聘中、外教师培养他，指望他“光宗耀祖”，称霸一方。在张作霖“宠爱有加”的环境下，年将二十，即“出掌军旅”。由卫队营长，旋升旅长、军长、军团长和“方面军”的最高将领，成了奉系军阀中的主要人物。在北洋军阀时期，他追随其父参加了几乎所有的军阀混战，并率奉军主力，对抗革命的北伐战争。

年轻的张学良，由于受过较多的教育，虽然也“具有一般知识青年的民主爱国思想”^①，不满帝国主义的侵略，并与郭松龄、阎宝航、杜重远等爱国、进步人士相友好；但他当时的行动主流，却仍追随其父，扮演着军阀混战和对抗革命战争的角色。这时的张学良，基本上还是旧军阀营垒中的重要将领。

从张作霖被炸到“九一八”事变前，是他政治生涯的第二个时期。也是他独自主政东北的时期。“国难家仇交织一身”，使他在思想上、行动上有了显著的变化。

一九二八年七月，他上台伊始，即和日本侵略者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为摆脱日本对东北的控制，他不顾日本田中内阁的阻挠、恐吓和软化，毅然实现了“东北易帜”。有人说：“东北易帜”，是东北“统一”于蒋介石，无任何进步可言。这种观点是片面的。它没有看到张学良在“东北易帜”中所表现出的高度反日爱国精神和高贵的民族气节。众所周知，当日本特使林权助，以张作霖“老友”自居，用长辈口吻，“命令”张学良，绝不许他“易帜”

^① 孙达生：《我所知道的张作霖和张学良》。《辽宁文史资料》第八辑。

时，张学良大义凛然地回答说：“我与贵国的天皇同庚（同岁）”（即位居你上），焉能受尔之命？这种具有民族尊严的机智的回击，永为国人所称颂。

从此，张学良将军在东北推行了一系列的反日政策，支持群众的反日斗争。在他的支持下，由阎宝航、车向忱等组织的“国民外交协会”、“国民常识促进会”等，提出“收回旅大”、“打倒满铁”等鲜明的反日口号，进行了广泛的反日宣传。当年，人民的“护路”斗争，遍于东北，对日本攫我铁路权的阴谋，给以沉重的回击。

大革命失败后，在革命运动已陷低潮的形势下，东北的反帝斗争，却蓬勃而起。虽原因诸多（如日本侵我东北的加紧和党在东北的活动），但与张学良的反日政策是密切相关的。

在这一时期，张学良在推行反日政策的同时，又努力倡导东北地区的建设：兴修铁路，开筑葫芦岛港；“鼓励官民兴办煤矿、纺织、窑业、农产品加工业；兴办教育事业，增拨教育经费，发展各县中小学……扩建东北大学”，自任东大校长……。取消封建的尊孔读经；提倡反日的爱国教育等等。

所有这些，都明显地表现出：张学良将军，已开始由封建军阀将领，转化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了。

但在这一时期，张学良将军，却犯了两大历史性错误：一是一九二九年，在蒋介石和美国唆使下，借“防止赤化”之名，轻率挑起了“中东路事件”：单方撕毁“中苏协定”，驱走苏方人员，派兵十万与苏联红军开战。结果损兵折将，劳民伤财，败后乞和。这不但损害了极珍贵的中苏友谊，为亲者痛，为仇者快；也暴露了东北军的实力，助长了日本的侵略气焰。

另一错误是：在一九三〇年，当国民党各派混战达于高潮、在蒋介石和反蒋派胜负难分之际，张学良在蒋介石的一再勾引、

利诱下，不顾日本入侵东北的紧迫，举兵入关，使东北国防空虚，为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造成了可乘之机。由此，他因助蒋有“功”，取得了南京政府的要职（海陆空军副司令），统辖了北方八省（东三省，华北五省），恢复了其父往日的地盘。这时，年仅三十的张学良，跃居显位，成了南京政府中仅次于蒋的人物，成了全国最大的地方实力派。当他南下参加国民党“四中全会”时，蒋在南京，举城欢迎，“狮子山炮台鸣炮十九响”，文武高官“一律身穿制服……渡江恭迎”，从天津到浦口的车站遍贴标语，盛赞他“拥护中央，大有功于党国”^①。这时，是张之势力达于“顶峰时期”。同时，因“踌躇满志”，生活无度，吸毒严重，也是他“在意志和精力上……落到最低线上的时期”^②。

从“九一八”事变，到下野出洋，是他政治生涯的第三个时期。也是他前半生中的低潮时期。

“九一八”后，国难当头，身为东北的首脑，是守土有责的。但他却听命蒋介石，执行蒋之不抵抗政策，“背着不抵抗将军的骂名，一听蒋介石的摆布。”

应该指出：他虽然执行了不抵抗政策，但与专心“剿共”、“宁亡于日，勿亡于共”的蒋介石，是有显著区别的。他很想抵抗，也确实进行了局部的抵抗：如组织锦州、榆关、热河的抵抗；多次派人持他的亲笔信，慰问、鼓励东北抗日义勇军；拨巨款支持“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活动；当他同族兄弟张学成叛国被擒时，他主张“立即枪决”等等。但这些抗日举动，是很有限的，也是不坚决的。其所以如此，除了迷信蒋介石的不抵抗指示和幻想国联干涉外，他认为，要抗战，单靠东北军是难以取胜

① 陶菊隐：《张学良的前半生》。② 解方：《西安事变前后张学良将军的政治思想变化》。

的。“九一八”的第二天，他即明确表示：“我们是主张抗战的，但需全国抗战；如能全国抗战，东北军在最前线作战，是义不容辞的”^①。但由于蒋介石坚持“剿共”，拒不发动全面抗战；张学良为保其残余实力，也只有忍痛从之。结果，在全国人民反蒋反张的声讨下，蒋介石为“舍车保帅”，“使苦肉计”，“使张下野”。他对张说：“我二人共乘一舟，但目前风浪太大，两人同乘，必有覆舟之险，应当下去一个人”。张无可奈何，只好“代蒋受过”，下野出洋。这是他一生中的首次下台，失意之情，是难以言喻的。

下野出洋的张学良，本应静思既往，总结教训。但年轻的张学良，由于阶级地位的限制，对蒋仍无认识。他在意大利等国，虽不到一年，但受毒很深。他欣赏“讲独裁，不讲民主，拥护一人为领袖的法西斯主义”。错误地认为，法西斯是德、意“复兴”之道，也是中国的“复兴”之道。因而回国后，“高唱拥护蒋介石，一切唯蒋之命是听”。随着政治上的失意，思想上也误入了歧途。他之拥蒋，又有“理论”根据了。

从随蒋“剿共”至“西安事变”，是他悬崖勒马，决心联共救国时期。也是他一生中的巨大转变时期。

出洋回国后，于一九三四至一九三五年，他受蒋之“命”，在“寇深祸极”的形势下，走上了他不愿走上的“剿共”之路。他先后任“鄂豫皖剿匪副司令”和“西北剿总副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率东北军进攻红军，在这条绝路上，他越走越不通，越走越痛苦。抗日救国的历史洪流，迫使他不能不悬崖勒马转变方向了。

促使张学良从随蒋“剿共”转为联共抗日的客观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起主要作用的：一是他的“剿共”战争的惨败，和由此而尝到了蒋之“冷遇”；一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强大感

^① 洪钊：《九一八事变当时的张学良》。

召，和党对东北军的耐心诚意的争取。

起初，张学良及其高级将领对“剿共”是很卖力的。他幻想“通过剿共的‘胜利’，取得蒋之信任，从而扩充实力，以便有朝一日，能够打回老家去”。但在西北，他“剿共”三个月，折兵近三师，两名师长阵亡，七名团长战死或被俘，这是东北军几十年历史上所没有的，给他以深刻教训。正如他日后在“自述”中所说：“可怕的失败，深创我心”^①。

由于“剿共”的挫败，他进一步尝到了蒋介石消灭异己的苦汁。对东北军的惨败，蒋介石不但毫无关切之意，而且乘机削弱之。取消被歼部队的番号，减发其军饷，甚至连张学良为阵亡者所请之十万恤金，也被“驳拒”，以致张悲愤感叹：“我的名望，已降低到不值十万块钱！”^②。特别是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当他到南京参加国民党“五中全会”时，败军之将，“大受奚落”，与一九三〇年蒋对他的盛大“恭迎”相比，真是“天壤之别”。这对张是莫大的刺激。他深深感到，蒋对他，“已不重视”，“内心开始动摇”了。

同时，因反共内战，张之所部，已“军无斗志，士多反蒋”。“九一八”后，他们背井离乡，痛感国破家亡之苦。但如今，不抗日专反共，内心悲切。他们大声疾呼：“与其与共产党打仗，还不如和日寇拼命”。在红军教育下，他们有的与红军联欢；有的自动放下武器。军心的动摇，对张学良的推动是极大的。

这时，日本侵略者已渗入华北，踏进绥远。抗日与反共的矛盾，国民党蒋介石与地方实力派的矛盾，独裁与民主的矛盾，在西北地区，尖锐地交织起来。在民族危亡的关头，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号召，发表了《八一宣言》，提出

① ② 西北大学历史系等：《西安事变资料选辑》第440页。

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领导了“一二九”运动，在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抗日救亡高潮。

民族危机的形势；共产党的伟大号召；和广大军民不可抑制的抗日救国洪流，推动着苦闷彷徨的张学良将军。他“绕室徘徊”，想过去，执行不抵抗政策，丢掉东北，代蒋受过，遭到全国人民的指责；看当前，作蒋介石的“剿共”工具，“既挨红军的打，又受‘中央’的气”，甚至整个东北军的生存都成了问题。他目睹全国的形势，认识到：在民族危亡的关头，只有接受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联合抗日，他个人才能在全国人民面前一洗以前的耻辱，东北军才有出路，中华民族才有希望。后来，他在“回忆”中写道：共产党的主张，“不但深获我心，而且得到大多数东北军，特别是青年军官的赞同，我开始想到，我们的政策失败了。为此，我征询部属的意见，结果提出的建议是：与中共及杨虎城接触，以谋求合作，停止剿共战争，保存我们的力量，团结其他方面共同抗日”^①。

于是，张学良开始了他一生中的转变，这是他政治生涯的重大转折。从一九三五年末开始，他主动接近东北进步人士李杜、杜重远等，寻找与共产党的联系。党早即重视对东北军的工作，立即派李克农、刘鼎、宋黎等同志到西安，与张学良进行亲切而诚挚的会谈，并留在他身边工作。党更通过教育释放的东北军军官（高福源等），说服、推动张学良。特别是毛泽东亲派周恩来，于一九三六年四月，在延安天主教堂与张会谈，解决了张的各种疑虑。“周恩来同志热情诚恳的态度，深刻精辟的分析，使张学良心悦诚服，极为钦佩。”这次会谈，“对张走上联共抗日的

^① 西北大学历史系等：《西安事变资料选辑》第440页。

道路，具有决定意义”^①。从此，张学良的政见完全转变了。

“延安会谈”后，张学良和杨虎城一起，在党的帮助下，在西北进行了一系列的抗日准备工作：建立王曲军官训练团，培养抗日骨干；成立东北军学兵队，吸收中共地下党派来的抗日积极分子和“一二九”革命青年；成立“抗日同志会”，做为东北军的核心力量，参加者全系进步革命的青年干部。不少共产党员，如栗又文、张潜华、孙达生、宋黎、解如川、刘澜波等均系该会的成员。在西安，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群众抗日运动，在张、杨的支持下，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西北各界抗日救国会”、“东北民众救亡会”，先后成立，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所有这些，标志着：在西北，党与张、杨间“三位一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建立起来了。这时的张学良，意气风发，决心救国，与前对比，已判若两人。

从上述张学良将军前半生四个时期的简要评述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他所走过的道路，确实是曲折、复杂的：进一步（如“东北易帜”后的反日斗争），退两步（如执行“不抵抗政策”和随蒋“剿共”）；但终于在激烈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全国人民反日怒潮的推动下，在中国共产党和蒋介石的正反面教育下，毅然实现了他跃进性的转变：从旧军阀的“少帅”，变成了联共抗日的救国将领。

张学良的转变，不是偶然的。除了客观外因对他的巨大推动之外，还有他主观的内因，即他长期形成的反日爱国思想。

他自幼即生长在日本侵略下的东北，对日本侵略者的猖狂气焰，是极其厌恶的。他不满意其父对日本的妥协退让，为此，“父子间曾大肆争吵”。他对“晃着肩膀”、耀武扬威的日本顾问们，极为“反

^① 罗瑞卿等：《西安事变与周恩来同志》第20页。

感”；他痛感让日本“浪人”到处乱窜，日本妇女在沈阳街头“穿着浴衣”，“招摇过市”，是中国的耻辱^①。一九二八年，他上台后，和日本侵略者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后来，他随蒋“剿共”，但“并不热心于内战”，时刻不忘侵略者。在武汉时，他以“苦水”招待东北同乡的集会，使之不忘亡乡苦。“在言谈中，无时无刻不为国难家仇而悲愤”，他时常和他的同事，“谈他自己的苦闷，谈他渴望对日宣战，好收复东北，谈着谈着就痛哭失声”^②。

这些，都充分说明，张学良虽有他拥蒋“剿共”的一面，也有他反日爱国的一面。他“对抗日始终是忠诚实意的”。对反共是消极的。他的反日爱国思想，是长期形成的。特别是“日本炸死他父亲，侵占他的地盘，使他的军队损失一半以上，财产损失百万以上”。这种特殊的遭遇，是和他处于同等地位的其他统治者所没有的，他怎能不产生强烈的反日爱国思想呢？

过去一些书刊，在谈及张学良思想转变时，主要强调他受客观外因的逼迫；而忽视他长期形成的反日爱国思想的内因，这是不全面的，也是不合实际的。因为思想、事物的变化，总是有其内因的，“外因是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

在中国近代史上，在上层统治者中间，有的人一直站在反动势力的立场上，坚持与人民为敌，走过他不光彩的一生；有的人，原来是革命者，后来叛变革命，甚至变成了汉奸；有的人，虽出身于旧的营垒，也曾是旧势力的主要人物，但在民族危亡的关头，却能毅然地联合进步势力，联合共产党，为挽救国家民族而献身。张学良将军就是这类人物中杰出的代表之一。近代的中国历史证明：真正的爱国者，迟早要走上联共的道路的。

① 松本一氓：《被遗忘了的贵公子》。 ② 王兰等著：《蒋总统与中国》第120

(二)

张学良的转变，集中地表现在他和杨虎城一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的发动，是他们“不满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要求立刻停止‘剿共’，停止一切内战，……并接受了共产党抗日主张的结果”^①。

“西安事变”前，张、蒋间的矛盾，已达到了不可调合的程度。尽管张学良一再“苦谏”、“哭谏”蒋介石，要他停止“剿共”一致抗日；尽管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尽管“国共合作”的密谈，已正在进行；但反动顽固的蒋介石，却一意孤行，举兵西北，逼张“剿共”。妄图在短期内(两周或一个月)，一举消灭党所领导的红军。

在“兵临城下”、“逼上梁山”的情势下，张、杨两将军忍无可忍，破斧沉舟，临潼捉蒋，发动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的发动，是完全“为了抗日救国”的。“是要以西北的抗日统一战线去推动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张学良在发动“事变”时所表现出的无私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自我牺牲精神，作为一个统治集团的旧将领来说，是罕见的。

“事变”发动后，西安的人们，当即以“英雄、冒险”四字评之。没有无私无畏的英雄胆略，怎敢冒权位的得失、生命的危险，来发动如此惊险的“事变”呢？

“西安事变”与过去的军阀争权不同，也不同于一般的军事政

^① 《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西安事变资料》第一辑164页。

变。它不是为了个人和某个集团的私利，而是出于善良的抗日救国愿望，以不怕牺牲的精神发动的。这种崇高的爱国主义思想，贯穿在“西安事变”的整个过程中。张学良将军在谈他发动“事变”的想法时说：“我们这次发动，把个人的荣辱生死完全抛开，一切都是为了国家民族”，“我们为了国家的复兴，早有生死以之的决心”^①，“我们的心地是绝对的纯洁的”^②。他号召所部：“下最大决心，献身国家民族”。他说：“我真不信我们中国不能复兴！我真不信我们中国不能脱离日本帝国主义的羁绊，我们要承认过去的错误，我们绝不一错再错，……中华民族终有自由解放的一天！”^③

当临潼捉蒋还没有找到蒋介石时，张学良焦急万分，他激动地对所部将领们说：“若是找到委员长，我一定说服他抗日；只要他抗日，我仍拥他为领袖；若找不到他，就割了自己的头，请虎城拿到南京请罪，了此公案，绝不能要停止内战而引起内战。若是如此，我张某便成了千古罪人”^④。从以上的简要表述中，可以明显地看到：张学良的思想，确实是高尚的，是为国无私的。

过去出版的历史教科书和有关刊物，在评论“西安事变”时，主要强调“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重大意义，这当然是极其重要的；但对张、杨发动“西安事变”的伟大历史功绩，却缺乏应有的评价。这种情况的产生，一方面是过去历史研究中“左”的偏向的影响；同时也许有“暗中保护”张学良的意图。历史研究应实事求是，特别是今天，我们更应如实地评价张学良将军的历史功绩。不但要赞扬他为民族为国家的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自我牺牲精

① 《张学良对所部讲话》1936年12月13日。② 《张学良在西安电台广播讲话》1936年12月14日。③ 《张学良对总部全体职员训词》1936年12月13日。④ 罗瑞卿等：《西安事变与周恩来同志》54页。

神，更要象周恩来那样，高度评价他在挽救民族危亡中的巨大贡献。

“西安事变”，是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强大感召下，东北军，西北军广大官兵爱国激情的总爆发；是国内革命、进步势力、抗日反蒋势力，和蒋介石的卖国反共政策长期斗争的结果；是“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但“历史的必然性，……丝毫不损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①；在西安事变中，张学良将军无疑是比其他任何人都处于关键的地位。没有他在西北的出现，没有他和共产党的联合，“西安事变”的发动是难以实现的。

当时，我们的祖国正处于民族危机、“寇深祸极”的关头；红军在长征中已大大削弱，刚刚到达陕北，处于地瘠民贫的环境中；蒋介石不但逼张“剿共”，而且调军三十万众，向我少数的红军进攻。困难是十分严重的。一场大的历史曲折将有不可避免之势。在这紧要关头，张学良、杨虎城，反戈一击，临潼捉蒋，强迫蒋介石“放下屠刀”，停止他急不可待的反动“剿共”计划；挽救了民族危机，帮助了中国革命，促进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和全面抗战的实现。因而周恩来对张、杨的评价是很高的，称他们为“千古不朽的人物”，誉之为“千古功臣”！^②

早在一九二五年，爱国将领郭松龄在倒戈反奉时，曾致信张学良，愿他“作新世界的主人”，不作“旧时代之梟桀”；愿“他为平民所讴歌”，不“为政客所崇拜”^③。但那时的张学良还不能摆脱他的“愚忠愚孝”，还不能摆脱旧思想的束缚。只有经过历史教训的冲击和共产党的帮助，他才在民族危急的关头，有了巨大的

① 《列宁选集》第一卷第26页。 ② 《周恩来同志在纪念西安事变二十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③ 赵毅：《郭松龄的崛起》（附录）